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四九七）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六五期 ——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08c）

【百家争鸣】	为什么不能给林彪平反？ ——兼评《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	丁凯文
【研究动态】	值得注意的水陆洲现象	卜伟华
【当事者言】	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	刘 晋
【书刊评论】	冀朝铸不可或缺的回憶	陈之岳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百家争鸣】

为什么不能给林彪平反？
——兼评《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

• 丁凯文 •

近来偶读辛子陵先生的《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不无收益。然而辛先生的该书中论及林彪事件时，却让人有重回邓小平时代那个《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感觉，在下不敢苟同，愿提出来以辛先生作一商榷。

一、研究历史还是算命先生算命

辛先生在书中提出：“但真理再向前多走一步，哪怕是向同一方向多走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我指的是不能给林彪平反，这个案不能翻。”那么是什么理由不能给林彪平反呢？辛先生拿出来一个并不存在的假设结论予以论证，即林彪如上台就“要培养林立果为接班人，这个小朝廷如果建立，中国就会沦为北朝鲜，会是更厉害的法西斯专政。”辛先生这里显然不同于以往的中共官方语言，不再强调林彪是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集团”，林彪要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云云，官方以往的指控实在太过荒谬，连辛先生都看出其中的破绽和吊诡，于是辛先生另辟蹊

径，给林彪加上了一项新的罪名：林彪要想搞新的家天下，林彪上台后必定传位于子林立果，使中国倒退回封建皇朝，使中国沦为当今的北朝鲜。

辛先生戴在林彪头上的这顶帽子不可谓不新，不可谓不大。然而这个假设罪名能成立否？首先这个罪名是站不住脚的。历史研究不是算命先生，绝不可用根本不曾发生过的事情向前推定历史上的人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真正发生父子相传者仅北朝鲜金日成一家而已，是一个个案，并非普遍现象。其他共产党，如苏联共产党，东欧共产党、越南共产党等均未产生这一现象。为什么？这毕竟与共产党自己昭告于天下的伟大信仰和理念背道而驰。共产党人自己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共产党人要为天下最广大的人民谋福利”，“共产党是人民的公仆”，父子相传与过去皇权专制的封建王朝有何区别？即使是中共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也绝不敢公开地搞家天下，毛泽东可以提拔自己的亲属江青、毛远新，可是毛泽东直到临死时也不敢将“皇位”直接传给江青或毛远新。连“英明神武、雄才大略、不可一世”的毛泽东自己尚且做不到这一点，辛子陵何以能确定林彪如上台就一定会将“大位”父子相传给林立果呢？如何就能肯定林彪一家要实行与北朝鲜一样的“法西斯专政”，而不是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呢？

这个世界上，谁家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将来能够出人头地，成名成家。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乃人之常情，西方国家领导人亦不例外。现代社会中，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北朝鲜除外），国家的领导人却不敢将国家之公器公然私相授受给自己的妻子或孩子。当然，中国的皇权专制传统根深蒂固，中共领导人往往刻意从小就培养自己的子女。然而现实社会中不确定的因素太多，谁也无法确保自己的子女就一定能够出类拔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文化大革命中最能一鸣惊人者，莫过于积极参加造反派组织。这类人数不胜数，最出色者就是王洪文。毛泽东的子女们李敏、李纳和毛远新都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名噪一时。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有恃无恐，敢于造反，因造反有功而一夕成名，随即开始步入政坛而逐渐身居高位，成为中共党内的“明日之星”。以林彪家庭而论，林彪当时如果真想培养林立果，最便捷可靠的方式就是与毛家看齐，让林立果积极投身造反运动之中，从而一举成名天下知。然而林立果却与毛家造反派们截然相反。林彪严禁林立果参与任何形式上的造反组织，林立果也的确从未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亦无“打砸抢”等劣迹，大学虽然没有读完即入伍，但是却潜心于空军的科技研究，他搞的科研小组有不少新的设想和研发，亦有相当的成果，还被毛泽东赞赏有加。这在那个造反混乱的时代里绝对是个异数。后来这个科研小组虽然被中共妖魔化为“反革命小舰队”，却仍然无法抹杀林立果当时的业绩。我们并不否认林彪的确想培养自己的孩子，但是这与辛子陵嘴里“林彪想搞北朝鲜式的家天下”毫不相干，整个一个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根本就没有发生的事情无论如何也不能构成林彪的特殊“罪状”。

二、正史乎？野史乎？

辛子陵先生写作这本书时，显然自认为自己是严肃的史学家，写的内容绝对都是“有所本”，乃堂堂正正的史学专家。辛先生更在自己一书的“导言”中断称该书的“历史事件和背景材料都是有根有据的。”换句话说，辛先生一书应属正史无疑。然而笔者读罢该书，却对辛先生的自诩颇多怀疑。

两年前，笔者读到辛先生的《林彪正传》，就深感野史乃辛先生的专长。那部《林彪正传》虽然名为“正传”，实乃章回小说体裁，东拼西凑了当年一些中共中央文件，自我编造了大量人物的情景对话，根本就是另一部京夫子式的稗官野史，如此的章回小说的东西全然没有任何注释和材料来源的说明。该书前半部分对林的军事才干有所承认，后半部分则是歪曲历史，毫无任何学术价值可言，编造的对话十分荒唐离谱。辛先生这次出版新书评毛是否走出了其擅长野史的体裁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此处仅举一例。该书下卷第638到639页，辛先生有鼻子有眼地编造了一段1970年9月末林彪与汪东兴的对话：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麻烦。怎么办呢？’汪东兴沉重地开口。

‘汪主任，这不是我们找麻烦，是江青、张春桥他们捣乱。我听说主席对你的检查比较满意，是吗？’

‘闭嘴，叶群！听东兴讲。’林彪这一吼，叶群不讲了，汪东兴也不讲了。

林彪起身在地毯上踱步，转了两圈才说话：‘现在我已经无法和黄总长他们保持联系了，其中包括和你的联系，为的是又怕江青、张春桥他们在主席面前告黑状。我经常收到一些来自各地的揭发材料和原始证据，都是他们的丑闻。我无法想像，为什么主席会听信他们谗言！东兴同志，你说呢。’

汪东兴说：‘我也无法解释这个问题。不过我想在这种情势下，林副主席为了主动，还是向主席写个检查比较好些。’

林彪双目放着寒光，直射汪东兴：‘怎么，你是想让我授人以柄吗，是你个人关心我，还是有人派你来当说客的？’

汪东兴窘迫无言。

林彪接着说：‘我要写了检查，主席马上批发全党，那就等于我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承认了我的所谓错误。不我不上那几个笔杆子的当，我没有什么错误，我也不会违心地写什么检查。’

‘我们该怎么收场呢？老这么僵着不是个办法。’汪东兴说。

‘这是毛主席考虑的事情，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和叶群以及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们都在接受审查。我们的历史是无可怀疑的。一切让主席决定吧，我从来相信他的领导和英明果断。’

林彪像打仗下了最后决心一样，坐在沙发上再也不说话。汪东兴讪讪告辞，叶群送客。”

这段所谓的林汪对话子虚乌有，纯属编造，其过程和内容从不见于任何个人的回忆录或人物传记，如汪东兴的《毛泽东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官方版《毛泽东传》，亦不见于有官方版色彩甚浓的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等等。事实上，1970年9月6日庐山会议一结束林彪就去了北戴河，根本就不在北京。其时汪东兴根本就没有去拜见过林彪，更何况那些活灵活现的场景对话。辛先生书中类似的编造比比皆是，如毛泽东与江青的对话，林彪与叶群的对话，林彪与林立果的对话等等，实在是不胜枚举。

此外，辛子陵先生书中还有其他很多来历不明却让明眼人一看即知的坊间杜撰。比如香港某政论杂志刊登的所谓《林彪日记》、《邓颖超日记》、《康生日记》等等，这些内容不乏“惊人之笔”，但是却经不起推敲，严肃的史学工作者绝不会将这类坊间传说当成正史写进自己的书中。不仅如此，辛先生还将坊间另一部野史王兆军的《谁杀了林彪？》当成正史大量拿来引用，这就更让人怀疑辛先生史学的功力和为文的目的。因为喜欢野史将其当作正史大力渲染并身体力行参与野史写作的人绝不是真正的史家，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文学创作者，与真正意义上的史家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他们的作品也只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消遣消磨时光的对象，绝无可能登堂入室成为传世的史学专著。

三、研究历史追寻事实真相就是翻案吗？

现下有一些人，一见到不同于官方版本说辞的研究，就惊呼“有人要搞翻案了”。辛子陵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历史研究与所谓的“翻案”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事情，可以说，既有某种程度的联系，又有很大的区别。历史研究追求的是历史事实与真相，探讨历史事件当中的因果关系。官方版的历史，尤其是中共党史，以往受到过多人为地干涉，历史事件被扭曲，历史人物被任意地拔高或贬低。真正的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还原那些被歪曲的历史。“翻案”则是政治人物的事。史家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本来就应秉持史家之良知，客观、公正地予以评述，而非秉承上意，曲学阿世。

为政治人物“翻案”通常是政客们的事，大多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上台，大举为文革当中被打倒的人物“翻案”，举其荦荦大者有“刘少奇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等。这些当年的“反面人物”一夕之间变为“正面人物”，得到歌颂、赞扬。然而研究历史却是史学家的事。历史学家不以现实政治的考量出发，不以迎合现实政客们的立场而研究历史，从而追寻历史之真相。如果历史学者们的独立、公正的研究与现实政治中的某些现象重合，也不能得出历史学家们就是为了“搞翻案”这样简单的结论。

以林彪事件而论，林彪是被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领导人否定的“反面人物”，林彪头上的帽子实在是多多矣。林彪到底是“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还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彪到底是“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还是与文革极左派斗争中失败的悲剧人物？这些都是当今中共政客们事情。任何对于林彪的重新评价，他们都更关注于是否会对当前的统治有任何不利因素，是否会产生连锁反应，从而导致对几十年来毛泽东功过、中共历史以及统治合法性的重新评价。而历史学家关注的是，为何会发生林彪事件，林彪事件的来龙去脉，林彪事件的具体过程，林彪事件的影响和中共日后政局的走向等等。显然，官方版的“林彪事件”有着太多的漏洞，所谓“林彪篡党夺权、政变杀毛”更是一个历史神话，经不起严肃认真地推敲。如果说，我们的研究推翻了中共官方的那些结论，也不仅仅意味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为林彪翻案，因为那实在是一个低档次的活动。作为认真严肃的史学研究者，我们更着眼于历史深层次的内容，虽然在客观上有为林彪事件澄清的倾向与事实，但是我们更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林彪事件的全过程，以达到全面、客观、公正地解释、评价林彪事件，揭示出那些被官方掩盖和歪曲的历史，同时也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使人们从历史的进程中得到经验与教训。如果辛子陵们对我们以往发表过的文章认真研读的话，他会发现，我们从不使用“为林彪平反”或“为林彪翻案”等字眼，因为历史不是“案”！如果辛先生们对此依然不依不饶地说我们的研究就是在为林彪搞翻案，那也只能证明了他们的浅薄和低俗，对此我们也只能敬谢不敏了。

四、林彪要当国家主席还是要当党主席？

自从1971年8月毛泽东南巡途中发明了“林彪要当国家主席”后，中共官方的史学著作都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一口咬定林彪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真正目的是林彪自己想当国家主席。这一说法已成为大陆党史界的“定论”。然而这一说法最致命的弱点是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予以支持，官方最常拿来指控林彪的证据就是913事件后的审查期间吴法宪的一个口供：“叶群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而这唯一的“证据”也被吴法宪自己推翻，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明指，这条“证据”是当时专案组逼供信的产物。显然，中共官方的指控实在站不住脚。这一点辛子陵先生显然也清楚地认识到了。为了弥补这一缺憾，辛先生竟然有了新的发明：“林彪想当党主席”。

初看到辛先生这一宏论还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是自己看错了，再细细品读后却令人啼笑皆非。辛先生指出“林彪想当党主席”的根据是什么呢？又是那本坊间野史《谁杀了林彪？》。该书信誓旦旦地说，林彪在“913事件”前夕对黄吴李邱说“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庐山会议前，是毛泽东自己亲自对我至少两次说到，他不想再当党的主席了，要当国家主席，国际上走走，扩大中国的影响，并提醒我发起这个建议。我是奉命行事。”辛先生为了使自己的说法显得更可信，还煞有介事地说：“为什么周恩来、康生提议设国家主席没事，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就成了‘反党纲领’呢？因为毛没有对周、康许诺过要把党主席让给他们，自己去作国家主席。”首先，这个“林彪对黄吴李邱的表态”纯属子虚乌有，属作者王兆军胡编乱造。黄吴李邱一起最后一次见到林彪是在1971年3月30日和31日，当时周恩来率黄吴李邱、李德生、纪登奎从北京赴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批陈整风会议的情况以及毛泽东的几次谈话。林彪

听完汇报后表示“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还为自己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作了解释。林彪在“9 1 3 事件”前夕根本就没有接见过黄吴李邱。辛先生怎么可以将如此无中生有的野史情节拿来当作论据？其次，中共党内人人皆知，毛泽东自延安整风后坐上了党主席位置，其地位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动摇的，谁都不可能打毛泽东这个党主席的主意。毛泽东根本就不可能对林彪表示自己“不当党主席而去当国家主席”。如果辛先生认为该情节属实，那么请辛先生告诉广大读者，毛泽东是在何时、何地以及怎样向林彪作过如此“让贤”的表示？又有何人或文字为证？众所周知，毛泽东可以将国家主席一职让给刘少奇，但毛绝不会把党主席和军委主席一并让出，那才是毛真正的权力杖柄。而国家主席乃是个虚职，这是尽人皆知之事。在宪法小组讨论国家主席一章时，林彪曾在1970年5月对军委办事组明确表示坚决不当国家主席，甚至连国家副主席都不当（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卷），林彪怎么可能会去惦记毛泽东的那个党主席位子？那不是主动引火烧身，自寻死路吗？辛先生的“故事”无论是事实上还是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实在过于荒诞不稽，聪明睿智如毛泽东者都未如辛先生般想出如此“绝妙”的“欲加之罪”。

五、林立果在林彪事件中的作用

在谈及林彪事件时，辛子陵先生特别提出，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推波助澜起了重要作用”。那么林立果起了哪些“重要作用”呢？辛先生给出了几条证据：由于有了空军司令吴法宪的“两个一切”（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林立果成立了“联合舰队”；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并在上海召开“三国四方会议”密谋政变事宜；林立果的所有这些“阴谋政变”活动均是林彪授意，林立果负责执行。其实，辛子陵喋喋不休提出的这些事项都是中共官方几十年来反复宣传的东西，不仅毫无新意，且许多内容都是虚构的、夸大的，所有重大指控均无直接证据证明，辛先生只能靠不断发挥其写章回小说的功力予以弥补，当然也就经不住认真严肃的推敲了。

第一，吴法宪是否在空军真的下过命令允许林立果可以在空军调动一切指挥一切？不可否认，吴法宪的确曾在一个私下的场合对林立果说，今后可以放手工作，有关空军的建设、科研技术和航空工业等问题都可以直接向林副主席报告，林立果可以在空军调动一切、指挥一切。吴的这番话显然有讨好吹捧之意，但更多的则是对林立果的勉励和关怀，期望林立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空军能干出一番事业。但是吴法宪的这番好意却被空军党办内部个别人加以放大，对外宣传出去，造成吴法宪的被动，吴法宪对此亦曾予以制止。吴法宪私下场合说的这句话，日后成为“两案”审判的重要指控。但是稍有知识水平的人都知道，军队的指挥权、调动权绝不可能这样私相授受得了的。吴法宪自己说“不要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就是林彪要调动和指挥空军，也要经过毛泽东的批准。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谁也不能够在空军中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吴法宪还说，“这个话我虽然在私下里说过，但是空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调动权，我从来也没有交给过林立果。事实上，也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见《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辛子陵指控林立果的活动是因为吴法宪的“两个一切”的授权显然不能成立。

第二，林立果是否成立了所谓的“联合舰队”？据吴法宪回忆，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一个调研小组，专门从事科研活动，林立果非常注重对外国军事实力的研究，通过调研小组的工作，林立果搞了一些发明创造，如远程雷达等。对于如何提高空军的整体实力，林立果也颇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如“建议研制垂直起降的飞机和短距离起降的飞机”，以及“空九师飞行训练安全经验总结”等，这些都不是坐吃干饭就可搞出来的东西，而是要脚踏实地作研究的结果。笔者曾看过叶挺儿子的一个回忆，谈及林立果想搞垂直起降飞机的研制，特地请了一些科研机构的人共同协商，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整体工业实力不行，造不出此种类型的飞机发动机，所以林立果的这个动议根本无法实现。但这却说明，林立果的确是动了脑子，想真正干出一番事业，提高中国空军战斗水平。据调研小组的陈伦和先生回忆，“在我印象里正如毛泽东所表扬的那样，

林立果非常注重科研工作。他每天都要看国外的军事和技术杂志，掌握动态；不断地给王永奎、许秀绪等人布置技术项目（如：彩色电视接收、飞行仪表的地面报警；电话机长途通话的增音等）的课题；还进口了不少器材和民用电器。由此产生大量的翻译任务，而且进度很紧，所以就形成了他到哪里，我就带上一纸箱的词典和书跟随到哪里工作的状况。”事实上，“联合舰队”仅仅是林立果私下里的一句玩笑话而已，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林立果成立了阴谋政变的“联合舰队”。中共日后将这个调研小组的作用作了无限的歪曲和夸大。

第三，“三国四方会议”是林立果召开的“政变黑会”吗？这个所谓的“三国四方会议”是官方多年来翻来复去重复的一个谎言。本人曾与令狐渊先生著有专文《“三国四方会议”真相揭秘》，刊登于2007年11月明镜出版社出版的《百年林彪》一书中。简而言之，南京空军高层内部长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几位主要领导人周建平、王维国、陈励耘以及原南空政委江腾蛟之间矛盾重重，几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林立果为了弥合他们之间的矛盾，1971年3月30日约他们谈话聊天。他们几个人有先来的，后到的，如周建平就是凌晨三点半时才到那里，那时其他几人聊得差不多了。尤其应该注意的是，这些人闲聊时，林立果还基本不在现场。聊天当中既没有涉及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更没有任何搞政变内容，谈话主要围绕南空内部党代会问题、部队的军事战备问题等。这些情节有许多当事人为证。中共1972年1月下发的林彪反革命政变材料中引用了陈励耘“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的不实证词，事后陈本人则坚决予以否认。1980年的“两案”审判中，官方再也不提这个所谓的“政变”证据了，对陈励耘、周建平也不得不作了“免于起诉”的决定。事实证明，中共官方指控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是林立果为了搞政变而开的黑会，纯属子虚乌有，故意栽赃陷害。稍微有点头脑的人也会看到其中太多的破绽。然而可笑的是，有些人，如辛子陵等对此是宁愿视而不见的。

第四，林立果的言行是林彪指使的吗？很多人在谈及这个问题时总认为，如果没有林彪的授意，林立果怎么可能如此胆大妄为，私下里与自己的几个亲信谈论什么“杀毛大计”。可以说，这是一个合理的疑问。但是合理的疑问还必须要有确实可靠的证据才能予以落实。可惜的是，中共官方的媒体、史书，包括辛先生的这本书均未能给出任何一条确实可靠的证据，辛先生甚至不得不发挥其高超的想象力，编造出林彪与叶群、林彪与林立果的对话，然后再通过这些杜撰来证明自己的论点。我们且看辛先生是怎么编造的吧。

辛书下卷642页说“林彪向儿子秘授机宜：‘一员猛打猛冲的大将，充其量只有匹夫之勇，而成不了帅才，真正的帅才应该会组织人，指挥人，利用人。要做到这点，首先要笼络人。要导之以高爵，养之以厚禄，任之以重权。’”于是就有了日后林立果的“三国四方会议”的召开。

辛书下卷第644页说“林彪曾对叶群说过：‘一个权字，一个快字，这是政变的两字诀窍。现代政变可以在一个早晨把权拿到手。搞政变，夺权的代价要最小最小最小，收获要最大最大最大，时间要最快最快最快，可是要找专诸这样的刺客也最难最难最难。’”

辛先生这番演义说书的本事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林彪这些密室私房“谈话”是何人在何时听到并记录下来？又是如何传之后世的？我们通读了辛先生的大作才知道，原来林彪要搞政变的“确凿”证据竟然都是出自辛先生自己的生花妙笔。国内学者孙焕英在一篇《他们何以听到林彪夫妇的私房话？》中说：“在我看到的关于林彪传记性的文字中，最显得丰富多彩的，是林彪和叶群两口子的私房话。不但写得具体——那些话都是加了引号的原话，而且连说话时四体的动作、五官的表情、声音的高低、腔调的抑扬也都写得生动，使读者好像在看纪录片。不过，我读这类东西多了，反而迷茫起来。例如，有一篇写林彪的文字，有记述林彪和叶群私下议论对付毛泽东的段落。在这段落中，林彪话是怎么说的，叶群话是怎么接的；林彪是怎么哭的，叶群是怎么叹的，有鼻子有眼。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林彪和叶群的私房话，‘作者’们是怎么知道的？”“关于林彪和叶群的私房话，传到‘作者’们的耳朵里，如果有一百个可能，那么，就

有一百二十个否定在等着它们。而事实上，那些‘作者’们虽然对林彪和叶群的私房话言之凿凿，而根据却是证之空空。这类‘作者’，是名副其实的‘作’者；这类‘纪实’，是名副其实的虚构。”孙先生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咱们的中国，有人死了，关于他们就可以任意编，因为死无对证；有人坏了，关于他们就可以随便骂，因为不算诽谤。所以，在咱们的大中国，历来是野史多而信史缺。‘改写历史’，也就成了一句伟大的号召。”（见《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4期），对照辛先生这番野史杜撰，孙先生此言诚不虚也！

第五，《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评价问题。辛先生站在中共官史的立场上对《五七一工程纪要》大批特批，这份《纪要》当然是个“恶毒攻击”中共的“反革命”文献，对它的历史作用自然是要彻底否定的，同时还要在“刺毛”一事上大作文章。然而站在独立史家的立场上，我们不得不指出，《五七一工程纪要》绝对是个载入史册的不朽之作。无论辛子陵们怎么贬低它咒骂它，都无损这一文献的历史性地位。《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最早吹响了揭露、抨击毛泽东假社会主义之名行皇权专制倒退之实的号角。该《纪要》无情地揭露了毛泽东专制独裁统治的实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乃“社会法西斯主义”。《纪要》还深刻地揭露了中国社会的现实，提出了改变中国的新的道路。可以这样说，直到今天，大陆出现的批毛文字，均未达到它的深度和高度，其中当然也包括辛先生的著作。中共日后走的改革开放道路不过就是实践了《纪要》中的思想而已。现在我们再回首这份纪要，我们不得不指出，它揭露了毛泽东时代的黑暗与文革的荒谬，其作用超过了大陆后来一切批毛的文字，令人叹为观止。邓小平上台后对毛泽东的否定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不及《五七一工程纪要》来得更深刻、更彻底。辛子陵们所抨击的《纪要》里武装政变一事实实在十分浅薄。看看华国锋、汪东兴们在毛泽东死后搞的“十月政变”，他们不过就是实践了林立果未能完成的事业而已。如果你承认华汪政变是终结文革救民于水火的伟大壮举，凭什么就要否定林立果所设想的政变呢？换句话说，如果1971年那次林立果设想能够成功，就会早五年结束毛泽东的文革暴政，也许会为中国提前开辟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由此可见，林立果设想的“政变”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是人们所不能否认的！

六、简评《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得失

《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是近年来评毛著作中较为突出的一部，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该书由国内知名人士李锐先生和谢韬先生分别作序，李锐先生更是以惊世之笔写下，毛泽东是“功劳盖世，罪恶滔天”。笔者读后有如下几点观感，简单提出来与大家分享。

第一，该书对毛泽东的揭露和批判，在深度和广度上在当今大陆党史学界前所未有

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直没有停断过，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反思毛泽东到底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了什么：中国社会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是光明了还是黑暗了？显然，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前面临着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如何重新评价毛泽东建国以来的历史。然而邓小平为了自己的合法统治，强行压下了评毛、批毛的浪潮，以一纸《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评毛定下了基调，即毛泽东依然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建国之后，特别是文革当中只是犯了错误，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云云。正是由于这份《决议》，大陆党史学界对毛泽东的研究和评论被严格限制在这个框架之内，无论是官方出版的正统《毛泽东传》，还是其他人物、事件的研究都只能以此为准，不敢越雷池一步，造成毛泽东研究的模式化，概念化，停滞不前。取而代之的是对毛泽东的歌功颂德，上至中共中央，下至各级党政机关依然将毛泽东视为“一代伟人”，毛泽东的罪恶不仅没有被清算，反而成为毛的高瞻远瞩、丰功伟绩。这正是邓小平留给人们的无解之题。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中国只有彻底抛弃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体系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和发展。辛子陵先生将毛泽东建国以来的所作所为作了系统的清理，较为全面、彻底的揭露了毛

泽东建国以来的种种倒行逆施，尤其是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以及毛泽东家天下妄图传位江青、毛远新的真实布局。这些都是辛先生此书的亮点之处，值得肯定。

第二，关于中国发展前途的理论上的新突破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经济上的巨人”和“理论上的侏儒”境界。中共一方面要搞经济上的改革与开放，抛弃毛泽东的计划经济、一大二公等闭关锁国政策，另一方面却要继续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在意识形态方面继续坚持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先天上就发育不足，那些自称为“毛派”的人就不断指责邓小平就是毛泽东当年批判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中共也无法摆脱“打左灯向右转”的窘境。理论上的侏儒必然导致经济上的反复和社会的动荡，“六四事件”就是典型一例。辛子陵在书中特别呼吁“只有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没有保护这一政策的意识形态不能成事”，“当务之急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说清楚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错误的来龙去脉，回头看一看那个‘左’祸肆虐，生灵涂炭的时代，揭穿毛泽东的假马克思主义，夺回话语权，使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彻底失去号召力。”以这么鲜明的态度直指中国社会发 展所面临的尴尬境地，并一针见血地点明中国必须彻底抛弃毛泽东祸国殃民的意识形态才能步出自我设限的窘境，才能走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大道。辛先生在体制内的敢言，其胆识和勇气令人钦佩，这点也是我们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第三，《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的不足之处

虽然辛先生在评毛批毛一事上有出色的亮点，但该书仍然存在一些严重的不足之处，有必要予以指出。

（1）对邓小平的过度推崇，以邓小平的是非为是非，且辛书所述内容依然没有跳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框架。无可讳言，邓小平在拨乱反正的年代里起了决定性作用，邓小平以批判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为开端，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在肯定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时，还必须清楚地看到邓小平与毛泽东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必须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在建国后至文革前的十七年里，作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也是“罪恶滔天”的。他们所不同是，邓小平复出后，部分地汲取了以前的教训，更加务实，经济政策上更加灵活、开放，没有那么多极左的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这对于冲破中共多年来的“左祸”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然而，邓小平为了自己的合法统治，强行压下党内批毛的意见，将文革当中的一切罪责放到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身上，为毛泽东作了开脱。中国人民在否定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之后绝不应该再搞一个邓版的“两个凡是”——凡是邓小平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邓小平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一手导演下出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当前史学界研究文革史的最大紧箍咒。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新的突破，对于文革当中发生的各种事件，就只能按“好人犯错误，坏人犯罪”的模式予以解释。辛先生在该书的扉页上坦承，1974年就根据邓小平的授意写了《林彪春秋的破产》。事实上辛先生从那时起就按照邓小平的这一思路解释历史，辛先生以后出版的《毛泽东全传》、《林彪正传》等都是这一思路的体现。显然，按照邓小平的旨意和党的决议阐述历史，必然会产生各种弊病，即迎合官方的正统思维，继续曲解、编造乃至篡改历史，这样一来对于历史的解释也就不可能客观与公正了。

（2）辛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缺乏客观公正的评论。官史对于历史的解释最大弊端就是为尊者讳。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被官方定位的好人，史书中是看不到他们的缺点的，更不用说他们所犯的罪责，而官方定位的坏人则一无是处，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要往坏处想，即使作过好事也必然是别有用心。事实上，文革中除林彪、康生、

陈伯达、“四人帮”外，大批老干部都曾积极参与，如周恩来、叶剑英等，他们没有一个真正反对过这场运动。周恩来更是毛泽东的大管家，一身兼了毛泽东文革运动的“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全力保障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没有周恩来的助纣为虐，毛泽东的文革很难顺利进行。连邓小平文革后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再例如，叶剑英文革当中也是积极分子，在斗倒罗瑞卿事件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可是在辛书中，我们是看不到这些真实历史的。我们看到的是，周恩来忍辱负重、呕心沥血，违心的讲话和做事，并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作了各种各样的斗争；叶剑英更是高风亮节，不仅有“二月逆流”的英勇事迹，更有后来的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历史功绩等等。然而历史绝非“非红即白”，而是多重性、多样性的。对于历史人物也必须作全面客观地分析，研究历史必须打破“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这种迷思。

（3）理论上的突破伴随着理论上的缺陷。辛子陵全书的落脚点在于论述，中国应该彻底摒弃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辛子陵先生的这个看法本身是不错的，但是却是一厢情愿的。辛书反复论证了欧洲一些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融合而达成一个和谐理想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西方社会，特别是欧洲一些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都不是在一党专制下的产物，他们原本就没有一党专制的传统，而是多党制的自由民主体制，这些国家逐渐发展到民主社会主义是不奇怪的。但是中国的现实却与西欧社会相差太远，辛子陵幻想依靠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达成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如果中共依然顽固坚守其一党专制体制，辛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永远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而已。只有彻底放弃一党专政，走自由民主的多党制发展道路，中国才能焕发出真正的青春，步入一个正常的社会。

（4）历史研究是一项严肃认真的事业，不是普通的文学创作，来不得半点虚假，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绝不可为了迎合“上意”而任意编造历史。辛子陵先生在国内军事院校任教多年，对此应该了然于胸，当年对“四人帮”篡改历史及史学为政治服务恐怕也是深恶痛绝。但是通读辛先生的《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最遗憾的感觉就是，辛先生配合官方的抑毛扬邓而作史，其文太不严肃、太不严谨，不仅许多重要内容、如关键的材料、数据没有来源或出处，而且大量引用坊间野史充做正史，大量编造历史人物的对话、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可媲美坊间流传的京夫子、师东兵等人的文革演义系列作品，这样也就大大降低了辛书原有的价值，辛先生的书可能最终也只能与京夫子等人的演义说书为伍，无法成为信史。也许辛先生本人不这么认为，但是有良知的史家对此是不屑为之的。

作者按：本文原题目为《就林彪事件的几个问题与辛子陵先生商榷——兼评〈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多维月刊发表时，将原题目改为现题目。

□ 原载《多维月刊》2008年8月号 第94—101页

【研究动态】

值得注意的水陆洲现象

• 卜伟华 •

最近在浏览网上文章时，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名字：水陆洲。

以水陆洲署名的文章有《邓小平的晚年之路》、《文化大革命简论》、《建设社会主义、进行继续革命、反对和平演变的强大哲学武器（学习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关于唯物辩证法的

论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习毛泽东的革命理论继承毛泽东的革命精神——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12周年》、《值得注意的政治新动向——评陈奎元在邓小平生平 and 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等等。这个水陆洲虽然观点很左，属于极端迷信毛泽东、完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人，但在他写的东西中，各种党史资料、文革资料极为丰富，尤其是他的《文化大革命简论》，简直可以称为一个文革资料库。我涉足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已有多多年，接触的材料也可谓不少了，但在水陆洲的《文化大革命简论》中，我还是发现了许多我以前没有看过的材料。

一、关于水陆洲这个人。

水陆洲，不知是真名还是化名。至今尚未发现其个人资料。他在《文化大革命简论》的前言中透露了一点个人经历：

我也亲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在文化大革命中，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守派，更不是当权派。文革初期，被借调到省委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过几个月。这时的观点是把起来向党委提意见的人看作是“右派”。回到原单位参加文革活动后，对一些人把各级领导干部都作为走资派来批的作法看不惯。对一些群众组织互相打派仗、搞打砸抢更是不满意。但是，当省军区把一个大的群众组织打成“反动组织”以后，经过反复调查认为省军区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确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群众提出的平反要求。一九六八年，在本单位革委会的安排下，参加了对几个人的历史问题调查，为他们澄清了事实。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〇年被下放农村当了两年“农民”（实际上不但由国家发工资，而且发粮食指标。有些人把这说成是“受迫害”）。

其间，真正与社员一道参加田间劳动只有半年时间，其余由县、公社统一分派到各个大队担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作队）队员。一九七一年以后调到一所学校工作，经历了批陈整风、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运动。一九七六年华国锋逮捕了江张姚王以后，思想上抱着怀疑观望的态度。一九七八年以后一些人大搞“非毛”，非常反感。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触动很大，对改革开放的资产阶级方向产生了怀疑。苏联、东欧的剧变更加深了危机感。从一九九二年开始系统地学习建国以来的历史，逐步提高了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我的这种经历也许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干部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以上这两段话，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简单的推论。水陆洲，年龄大约在60至70岁之间，因为太小，不可能“亲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太大则没有精力写出像《文化大革命简论》那样繁琐的长篇文章。职业大约是机关干部或教师。所处地域不好判断，但基本上可以排除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自治区（内蒙、宁夏、新疆、西藏、广西），而且大致可以排除大军区所在的省（江苏、广东、湖北、四川、山东、辽宁、甘肃），因为这些省在文革中与军队的矛盾都会直指大军区而不是省军区。他用的署名“水陆洲”，是湖南长沙湘江中流一狭长小洲，因产橘，又称橘子洲。我猜想，他可能就是湖南人。从其文章观点分析，他崇拜、迷信毛泽东，肯定文化大革命，反对邓小平，反对改革开放，大致属于新左派的范畴。

二、水陆洲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

（1）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观点。水陆洲认为对文化大革命有三种基本观点，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基本肯定论，以王年一、席宣、金春明为代表的全盘否定论，以邓力群为代表的基本否定、部分肯定论。这本《简论》试图继承第一种观点，吸收第三种观点中的合理成分，同时也回答一下第二种观点。（《文化大革命简论·前言》）

（2）水陆洲认为毛泽东文革前对党内情况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党内确实存在着“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

近三十年的情况恰好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对党内情况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在党的县委以上的领导干部中出现了一个脱离群众的“官僚阶层”、“官僚主义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党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存在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正是根据这种情况，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在周恩来等等（包括当时的林彪、康生、陈伯达）的支持下，经过党中央集体讨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文化大革命简论·第一篇·概述》）

（3）认为文化大革命没有失败，文化大革命是胜利了。

打个比方，苏联现在解体了。从苏联的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遭到了一次巨大的挫折或挫败。但由此可以推论说：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失败了吗？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失败了吗？苏联的卫国战争失败了吗？同样，中国现在正在向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演变。由此可以推论说：为建立新中国而进行的解放战争失败了吗？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失败了吗？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了吗？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斗争失败了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近四十年的实践，特别是近三十年的实践，告诉人们：

由于没有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东欧发生巨变，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个垮台！

由于没有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苏联骤然解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垮台了！

由于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逐渐演变，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被否定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被否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处于危机之中！

只要人们是站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对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历史性的胜利和功勋，就不会有任何怀疑。

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党内的健康力量和广大工农兵群众及其知识分子这个沉默的多数，逐渐奋起与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进行顽强斗争，就是证明。

（《文化大革命简论·第二篇·概述》）

（4）水陆洲要开展“大批判”：

学习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必须批判党内的修正主义思潮。当前要着重抓住以下一些方面：

（一）批判否定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修正主义思潮

- 1、批判所谓“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观点；
- 2、批判鼓吹一九五七年以后、观点甚至建国以来毛泽东执行了一条极左路线的错误观点；
- 3、批判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错误观点；
- 4、批判“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

（二）批判鼓吹剥削阶级消灭论的修正主义思潮

- 1、批判在中国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再也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
- 2、批判在中国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了、再也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错误观点；
- 3、批判在党内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存在“走资派”夺权危险的错误观点；

（三）批判鼓吹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思潮

- 1、批判瓦解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蚕食国有经济、无限发展私有经济的错误观点；
- 2、批判瓦解按劳分配制度、推行贫富两极分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错误观点；
- 3、批判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把我国经济推上资本主义全球化轨道的错误观点；

（四）批判鼓吹在党内搞全民化的修正主义思潮

- 1、批判瓦解党的阶级基础、把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理人拉进党内的错误观点；
- 2、批判改变党的干部路线、把资产阶级分子和自由化分子送到各级领导岗位、让领导干部到私营企业充当代理人的错误观点；
- 3、批判篡改党的民主集中制、只允许少数人大发修正主义议论、不允许大多数党员发表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意见的错误观点。

（水陆洲：学习毛泽东的革命理论继承毛泽东的革命精神——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12周年）

（5）水陆洲彻底否定邓小平理论，认为邓小平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对他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水陆洲在《邓小平的晚年之路》一书的结尾处写道：

“邓小平理论”的要害：

1，邓小平倡导的所谓全面改革，其核心是所有制改革，从社会的所有制结构来说，是大力发展私有制，从公有制内部来说，是扩大私有成分、缩小公有成分。但公开的只说是经济体制改革，是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变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关于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在邓小平理论中不占有任何地位。这样就有意模糊了人们的视线，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我国社会经济基础发生的重大变化，处于一种无知无觉的麻木状态。

2，邓小平倡导的全面改革，其最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产物，就是孕育出了一个庞大的小资产阶级和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明显地改变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力量对比。但是，从改革一开始，邓小平就反复地说，他的改革决不会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决不会导致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否则，就说明改革是失败了。直到一九八六年，他才改口说，产生个别的剥削阶级分子是可能的，但仍然坚持说，决不会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在他的影响下，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都绝口不提我国这些年来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的新变化；更不承认在我国已经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小资产阶级和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样，就实质上放弃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原理。

3，邓小平在一九七九年以后，虽然口头上也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仍然存在某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有时甚至很激烈，但是他认为，这表现为敌我矛盾，在人民内部矛盾中，不存在阶级斗争。这样的话也只在每隔五年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说一句。他把“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两者绝对对立起来，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完全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根本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他不准用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阴谋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来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藉口只要省部级以上干部知道就行了。一九八九年东欧事变，一九九一年苏联瓦解，即使在高级领导班子中，也没有认真总结东欧、苏联和平演变的经验教训，在我国采取有力的、系统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措施。从而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丧失了观察和认识社会的最有力的武器，在国内外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进攻面前，放松了警惕，解除了武装。

4，邓小平的晚年走过的道路，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对他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社会主义

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水陆洲：《邓小平的晚年之路》）

（6）水陆洲认为周恩来“始终如一地、坚定不移地站在毛泽东继续革命路线的一边”。我认为水陆洲的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周恩来就是周恩来，无论是拥护也好，支持也好，拉拢也好，他始终如一地、坚定不移地站在毛泽东继续革命路线的一边，为搞好文化大革命而尽心竭力。文化大革命的七分成绩有他的一份功劳，文化大革命的三分错误也有他的一份责任。正像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都有他的局限性一样，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缺点错误。我们不应该苛求前人。但是，周恩来决不是一个口是心非、两面三刀、明哲保身的人。（《文化大革命简论·第二篇·概述》）

（7）水陆洲认为文革后走的是资本主义方向，现在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毛泽东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复辟。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过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盲目照搬资本主义西方的模式而已。

正如有人说的：“近30年时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与此同时，贫富分化、物欲横流、贪腐遍地、犯罪猖獗、崇尚利己、信仰危机，帝国主义张牙舞爪，分裂势力明火执仗。‘六四’风波创巨痛深，黄赌毒黑变本加厉，F L 功呼风唤雨，陈水扁沐猴而冠，似曾相似的内忧外患纷来沓至。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成克杰，居然成了十恶不赦的贪污犯，问题的性质似乎已经超出简单的反腐败范畴。无庸讳言，当年毛泽东不择手段所要防止的资本主义复辟，许多现象已经预言式的出现了。”

中国走上了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有时，社会主义的方向占上风，有时，资本主义的方向占上风，总的来说，是资本主义的方向越来越多地占上风。由于资本主义的方向路线的实行，根本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文化大革命简论·前言》）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原则如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等等，对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是相同的，在小的原则和这些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又是不同的。正是根据这个原理，毛泽东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

道路”的问题。有人说，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盲目照搬苏联的模式，没有“中国特色”。其实，他们所谓的“中国特色”，不过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盲目照搬资本主义西方的模式而已。（水陆洲：《建设社会主义、进行继续革命、反对和平演变的强大哲学武器——学习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

三、怎样看待水陆洲现象？

在网上诸多文革研究者中，还有一个叫“老田”的人，与水陆洲有些相似之处。老田据说是个年轻人，在对待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上观点与水陆洲有些共同点，也写了不少文章，还搞了一些文革亲历者的访谈录，在网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去年有个朋友对我说，老田搞的访谈录里错误百出，有可能误导后人。我则认为搞口述史确实难以做到不出一点儿差错，哪怕有很多错误，但只要他能忠实记录当事人的话，为后人留下一些真实有用的东西，他也是做了好事了。

水陆洲很有幽默感，他把他那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超级长篇大论定名为《文化大革命简论》。我统计了一下，这篇尚未完成的长文字数现已达到近千万字！当然，这也和他的独特的写作方法有关，他是把所有的有关材料全部罗列在一起，然后加上少许自己的话。这样的文章可能很少有人能够完整地看一遍。但对于有心的研究者来说，却是很有用处的。

网络时代使许多原来几乎办不到的事情变得轻而易举了。过去我们会到潘家园或旧书店去搜寻难找的文革资料，费尽千辛万苦，却所得甚少。现在，我们可以稳坐家中，轻敲键盘，海量信息会如潮水般涌来，多得让你应接不暇。当然，现在也有个如何对大量信息进行筛选、鉴别、整理的难题。

像老田、水陆洲这样的文革研究者的出现，确实也是我们的一个中国特色。现实的情况是：有关文革的档案资料被严格封锁；文革成为新闻出版界的一片禁区；当局者严密控制在主流媒体上进行实实在在的文革研究。但现在终究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在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要真正禁止人们对文革的研究是根本办不到的。官办的研究机构不搞，或搞不了的文革研究在民间却是方兴未艾。当然，民间研究开始总是比较无序、比较零乱，良莠不齐，但这总比悄无声息或万马齐喑要好得多。

对老田、水陆洲这些人，我要说的是：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但我支持和捍卫你们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力。支持你们继续进行理论探索和对“文革”的反思，即使在探索和反思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偏差，也可供世人讨论和借鉴。现在更大的问题在于对“文革”问题上的虚无主义倾向。这种虚无主义的表现是无视“文革”历史的存在，对惨痛历史教训采取回避或轻描淡写的态度，压制人们对“文革”历史的研究和反思，封锁人们了解“文革”历史的渠道。历史决议否定了“文革”，但不能一否了之，反思和总结“文革”历史教训的任务还摆在中华民族的面前，需要全民族认真对待。在虚无主义倾向的影响下，一些歪曲历史，为“文革”招魂的奇谈怪论频频出现。有些人把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重新拿出来进行宣扬。绝大多数过来人痛定思痛，对文化大革命深恶痛绝，但年轻人对文革并无深切感受，他们以及他们的下一代或许会受到蛊惑，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真相或许更加不易复原。

唐朝大诗人杜牧在总结秦朝速亡的教训时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历史，认真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我们也会面临重蹈覆辙的危险，历史的悲剧也可能会重新上演。

□ 选自《卜伟华的博客》

~~~~~  
【当事者言】

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

• 刘 晋 •

“红卫兵”最早起源于北京清华附中，当时我是清华附中的工作组长，我亲眼看到了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1966年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批判学校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文化革命出现了高潮，学生自动罢课，领导组织瘫痪。

1966年6月3日，在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北京新市委书记吴德和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参加，决定领导文化革命的八条政策，并把领导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任务交给团中央。当晚在北京市委礼堂召集有关各单位领导参加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

中央团校决定由我和滑隆同志参加这次会议，听取吴德和胡克实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第二天6月4日上午，通知我和滑隆同志到团中央去参加紧急会议。胡克实同志讲：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团中央决定成立领导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总团。他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惠书昌任总团正、副团长，每个区成立分团。海淀区有六十六所中学是重点，也要成立分团，并决定由周杰、刘晋、滑隆为领导小组分任分团正、副团长。

◇ 进驻清华附中建工作组支持革命

1966年6月4日中午，我即带领中央团校五位同志到达19中，了解了情况后，建立了工作组。经过几天的工作控制了局面。第五天6月8日中午，我接到总团胡克实同志的紧急电话。他说：海淀区清华附中部分学生已自发组织了革命组织“红卫兵”起来贴大字报揭发、批判学校领导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但学校当局也组织学生保护学校当局。因为保学校当局的是多数，所以“红卫兵”受压制，处境困难。他要我立即带人去清华附中建立工作组支持文化革命、支持红卫兵、支持全校师生起来揭批学校领导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胡克实同志强调，清华附中是一个有影响的中学，是他亲自掌握的两个重点学校之一（另一个是城里的师大附中）。他要我每天晚上九点用直线电话向他汇报清华附中的情况。

我感到任务紧急又重要，立即带领五人直奔清华附中。我把带来的五位工作队员撒下去，要他们看大字报，找不同年级、不同观点的人谈话，了解情况。我自己在学校也转了一圈看大字报，找校长万邦儒问了问情况，然后又找“红卫兵”的头头了解“红卫兵”组织的情况。据他们讲：五月份校方要发展一位学习用功的、家庭出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学生入团，而王铭、卜大华、张小宾、邝滔生、罗小海等七个人（家庭出身都是高级干部）认为共青团组织应该执行阶级路线，不应该发展这个学生入团。为此，他们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校当局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宣布：谁继续把矛头对准学校，谁就是反对校党支部，也就是反党。

当时这七个人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在夜里跳墙出学校到圆明园开会，并决定成立一个组织，起名为“红卫兵”，并以“红卫兵”的名义在6月2日写了一批批判学校当局执行“资产阶级”

的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学校当局开紧急会议，组织学生写大字报进行反击。因此，几十个同学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处于孤立状态。

6月8日，我进驻清华附中了解情况后认为，这种混乱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当即决定让学校通知在大操场开全校师生大会，我以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和工作队名义，宣布成立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工作组，负责领导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工作，我兼任组长。我传达了北京市委“八条”并作报告，报告主要强调两条：（一）支持文化革命，支持揭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二）要有领导地进行，要讲政策，即“八条”。我的报告受到欢迎。

群众运动起来之后，我立刻发现了一些违反政策的过火行为：1.对一位女体育老师的批斗；2.要批斗一位高中二年级的女同学。因为她是北京市一位局长的女儿，她父亲被打成“黑帮”；3.初中三年级的同学要批斗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的女儿。我立即召开大会宣布：第一，不准冲击学生；第二，不准冲击老师；第三，对学校领导万邦儒只准动口不准动手。

清华附中的运动开展得比较正常。6月下旬，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主要精神是逐步引导学生“复课闹革命”，对各大中学校普遍成立的“红卫兵”要采取消化、溶合的方针，即把“红卫兵”中的头头，表现较好的，吸收到共青团领导机构中来。

#### ◇ “红卫兵”写“造反有理”的大字报

当时中共中央对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的方针政策与“红卫兵”的那种革命精神是相抵触、相矛盾的。不过，我当时还未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

我正在教学楼的走廊上看大字报，“红卫兵”的头头卜××和邝××拿了一张他们写的大字报给我看，并征求意见。根据记忆，大体内容是：我们要敢于造旧制度的反。要像孙悟空拿起金箍棒一样，敢于造旧制度的反，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有人说我们过火了，我们不怕，我们就是要把这火药味搞得浓浓的……我看了后，当即表示了几点意见：一是，造不合理制度的反，揭发批判不合理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是对的，中央也是支持的，但要讲政策，不能乱来。二是大字报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我要他们去读毛选，看看毛主席在这方面有什么论述，用毛泽东思想分析问题。

当时，这张大字报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对我要他们讲政策不能乱来不满意，并说工作组保守了，后退了，他们开始与工作组有矛盾。本来这种大字报也是针对工作组的，但是我建议他们读毛主席著作，按毛主席指示办这一条，他们接受了。

6月24日清华附中出现了一些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后来知道，他们在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上，从一篇并不太引人注意的短文《汉弗莱的哀叹》中，找到了一段黑体字，即毛主席在延安庆祝斯大林诞辰60周年大会上的一段讲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经他们修改后，把“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张贴出来。我看到了，还是没有引起重视。真想不到，这张“造反有理”的大字报是那样符合中央文革的要求，并神通广大地经中央文革江青之手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不仅对这些大字报加以赞扬，而且给“红卫兵”小将写了回信，这是后话了。

#### ◇ 工作组和红卫兵发生矛盾

根据中共中央统一的布署，7月中旬以前各个学校要转入正规，因此胡克实同志要求我尽



快解决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问题。我的方针是，让“红卫兵”头头中的两个人参加团委领导工作，张小宾为团委副书记，马某某为团委委员。这样一来，与“红卫兵”的矛盾就公开暴露了。

7月中下旬，陆续听到工作组被赶出学校，不少大中学校又失控。后来我们才知道，毛主席7月18日回到北京，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是束缚群众的革命手脚，这话又由特殊的通道传到高干子弟那里。但我们却蒙在鼓里，即使是团中央领导人也不知晓。我遇到的一件事足以说明。

那时我们还是想说服“红卫兵”的。我们去家访，通过家长作这几个红卫兵头头的工作。7月27号的夜晚，我们先到张小宾家，工作进展比较顺利。接着我们去×××家。×××父亲是解放军××学院副院长。我还是介绍了清华附中文化革命的情况，并希望家长帮助我们做工作，我的话还没讲完，这位副院长就打断了我的话，并神气十足地讲：“工作组为什么不能反？！团中央为什么不能怀疑？！你们派到101中学的工作组副组长讲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用这种口气讲话，真使我大吃一惊，话是谈不下去了。

告辞后，我让车子立即开到团中央。我感到问题很严重，怕是中央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找到总团副团长惠书昌同志，向他汇报了××学院副院长说的话，并说出我的看法。惠书昌也感到问题严重，立即拨通克实同志家里的电话，让我汇报情况并说出我的忧虑。克实同志回答说，不会有问题，我们派工作组是少奇、小平同志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的，会后还飞到杭州得到毛主席的首肯，你放心大胆地工作。

#### ◇ 周杰被“罢官”

第二天7月28日我回到清华附中，晚饭后正在院子里看大字报，约晚上十点钟左右，突然院子里一帮学生高呼“周杰罢官了”，中央文革今天晚上在北京展览馆大会上罢了他海淀区分团团长周杰的官。这消息一传到清华附中，学校一下又热闹起来。一些学生把我围起来让我表态。我说我们执行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和政策。我们工作组到学校里来，支持同学革命，我们工作组在清华附中的工作你们有目共睹。至于为什么中央文革派王力去罢周杰的官，我没有去参加会，不了解情况。我也是刚才听你们说的。我理直气壮地回答。

我把工作交给副组长回到团校，只有马石江同志在。他也莫名其妙，也在等消息。大约十点多钟，北京展览馆的会开完了，周杰、滑隆二人回来。他们讲了一下情况：周杰正在作报告，突然某某中学的学生代表站了起来说：“我们学校工作组压制群众起来革命……”接着又有几个中学学生代表也站了起来提意见。但是有的学生代表不同意这种作法，也站起来说：“你们有不同意见可以，但让周杰讲完嘛。”周杰同志赶快表态说：“先让提意见的学生代表把话讲完。”正在这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带着一些随从赶到北京展览馆会场，神气十足地走到台上，不问情况立刻宣布：“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周杰，压制群众起来搞文化革命，压制革命小将。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宣布，撤消周杰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职务，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自己解放自己。”他还宣布，明天还在这里继续开海淀区中学文革学生代表大会，对海淀区文化革命工作队周杰进行批判，各中学作好准备。这就是所谓的“周杰罢官事件”。

后来我们知道，当天晚上北京师范大学在操场开大会，揭发批判校领导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都去参加。这时在北京展览馆参加会的某中学学生代表跑到北师大操场主席台上对江青说：北展正在开海淀区师生代表大会，海淀区文革工作队队长周杰压制民主，压制革命群众。江青听后立即派王力去北展会场罢周杰的官，还要搞什么“揭盖子”，矛头对准团中央，要通过罢周杰的官打开缺口。

#### ◇ 在胡耀邦住处开会

7月28日夜里11点多钟不断传来消息，十九中学、八一中学、十一中学等学校开始打、撵工作组，说工作组是‘黑工作组’。胡克实同志让马石江、周杰、我和孙英立即去他那里。胡克实同志要我们到胡耀邦那里汇报情况。

我们有一年多没有见到耀邦同志了，1964年中央调耀邦同志去西北局任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但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还未免去。他回北京看病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虽然胡克实同志是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总团团长，但遇到这种大事，他还是带我们到耀邦那里听听他的意见。

周杰把会上的情况汇报完后，耀邦同志开口了，谈了几点意见：“克实要立即把这情况向邓小平同志汇报。要坚信党中央，克实是在少奇、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接受任务领导中学文化革命的，派工作组也是中央决定并请示了毛主席。我看现在这种情况（指罢周杰官）很不正常，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要观察观察再说……”

“中央文革小组明天决定开大会继续揭发批判周杰，怎么办？”

“周杰同志继续去听听意见再说，团中央可以派一位书记去表示同意撤周杰的职务的决定。”这时马石江说：“他们为什么这样胆大？谁是他们的后台？”

克实同志愤愤不平地讲：“他们，几个拿笔杆子的，懂得什么群众运动！”

我说：“这后果很严重，有几个工作组的同志被打，被撵的还要多，我怎么向工作组的同志们回答？”

“除了克实同志向小平同志汇报外，你们也可以把情况向中央反映嘛。”耀邦同志最后讲。这后来被称为“关东店黑会”，没有开出什么结果。

第二天7月29日，周杰、滑隆照样去参加大会，站在那里被学生代表一个一个批判。团中央还派了书记处书记王照华表了个态：同意中央文革罢周杰的官。这次批判会规格很高，中央文革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还有王力、关锋都参加了。我因为头天的会议没有参加，所以不用去挨批斗，在团校“坐镇”，不断接到各工作组被批、被围攻、被打的电话，团校的工作人员也非常气愤。

#### ◇ 向毛主席写信告中央文革王力的状

马石江和我商量，写一封反映工作组现在被围攻、被打的信，送给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信写好后由我和另一位同志送到北京展览馆，当时康生、陈伯达、江青正在那里开批判周杰的大会。我们天真地送到康生手里，希望他转给毛主席。

这封信不仅没有起到改变工作组被打被撵的作用，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我把那封信打印成几份，由我带着工作组的几位同志到处去反映情况，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华北局、北京新市委。反映情况的目的是要求制止打、撵工作组。我坐车整整跑了两三天，却如石沉大海，而中学生打人、撵工作组已发展到打“黑帮”（学校的当权派）批斗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局面进一步混乱。

后来我也被“罢官”，关牛棚三年。罪名是：

一、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二、参加了“关东店黑会”；

三、向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告中央文革王力的状，实际上是告中央文革的状。

（作者系原清华附中工作组组长）

□ 《炎黄春秋》2008年第5期

~~~~~

【书刊评论】

冀朝铸不可或缺的回憶

• 陈之岳 •

曾任毛泽东、周恩来与邓小平英语翻译的冀朝铸，推出英文回忆录，以坦率笔触披露了中南海与中国外交部的权斗内幕及中美关系秘辛，也揭开江青与王海容恶斗内情。

在中国与西方发生一连串重大外交变化的关键年代，一直担任毛泽东、周恩来与邓小平英语口语译的冀朝铸，最近推出海内外期待已久的英文回忆录《毛的得力助手》(The Man on Mao's Right)。这本由美国兰灯书屋(Random House)出版的自传副题为：《从哈佛广场到天安门广场，我在中国外交部的生涯》，全书三百五十四页，附多帧图片，售价二十八美元。作者以坦率的笔触，披露了不少中南海与中国外交部的权斗内幕和中美关系秘辛，新书面世后已引起美国外交界和知识群众的高度重视。

冀朝铸的妻子汪向同，一九九七年曾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我的丈夫冀朝铸：四十四年的外交生活》。一九九九年北大出版社亦推出了冀氏本人的回忆录。但这两本着作皆因顾忌太多而失之简陋。自认“中文程度不够好”的冀朝铸，坦承他的英文回忆录即是在《我的丈夫冀朝铸》一书的基础上，加以扩大充实而成。不过，在写作过程中，冀氏获得美国专业“捉刀人”福斯特·韦楠斯(Foster Winans)的大力协助。冀氏在自序中表示，中国政府和党一向不鼓励官员记日记和作笔记，尤其是外交部，因此他必须依赖其妻惊人的记忆力、同事的叙述和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等人的回忆录，始克完成此书。

冀朝铸的家世贯串整个中国政治、经济与外交，是一部近代中国的缩影。

今年七十九岁的冀朝铸，生于山西太原，九岁随父母和兄妹等六人移居纽约，住在曼哈顿二、三大道之间的第十二街。冀氏在纽约完成中、小学教育后，以优异成绩就读哈佛大学化学系。一九五零年韩战爆发，心向祖国的冀朝铸放弃学业，毅然返国，插班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再转入物理系，以便将来参加制造原子弹。一九五二年，冀氏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辍学参战，不久和谈开始，冀氏加入中国和谈代表团。谈判地点先在开城，后移板门店，冀氏具体工作只是英文打字和纪录。

冀朝铸父亲冀贡泉为山西闻人，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法科，曾任山西省教育厅长，一九四七年曾应胡适之邀出任北大法律系主任，一九五八年在北平去世。冀贡泉旅美期间，曾和中共地下党员徐永英、唐明照共同创办《华侨日报》。一九四零年七月七日出版创刊号，冀贡泉担任总编辑，唐明照则为党代表。其时，冀家与唐家关系密切。一九四三年，唐明照出外旅行时，其妻生了一个女儿，冀贡泉为她取名“闻生”，意思是说唐明照未看到而是听到女儿出生，故曰“闻生”。唐闻生的英文名字是 Nancy，一九五零年九岁时与家人一起回到中国。

多年后，唐明照成为联合国副秘书长，唐闻生从北京外语系毕业后，亦因英文出色而进入外交界，冀朝铸并向外交部推荐她升官。但唐闻生在思想上却越来越左，起先常和冀朝铸辩论政治问题，后来却变成吵架。唐闻生走进了毛泽东的核心圈里，她和毛的表侄孙女王海容开始

修理冀氏，冀氏和唐闻生的友谊从此断绝。冀氏在回忆录中对唐、王予严厉抨击和谴责，尤其是唐闻生。他说唐是“最大敌手”(principal adversary)。

冀朝铸的同父异母大哥冀朝鼎在国共关系史上亦是一名声显赫人物。这位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才干之士，凭藉山西同乡前辈孔祥熙的关系在国民政府财经界担任要职，但他实际上却是卧底的中共地下党员。一九四九年曾负责接收上海中国银行。冀朝鼎多彩多姿的一生，一直广受注意。现任犹他州欧格登市(Ogden)韦伯(Weber)州立大学的陆易斯(Gregory S. Lewis)教授，即以冀朝鼎的生平为博士论文题材。

◇ 四十四年外交生涯

冀朝铸于一九五二年加入外交界后，从此即在翻译、谈判、当使节和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外交生涯中浸淫四十四载，而于一九九六年六十七岁时退休，夫妻卜居北京。两个儿子冀小坦和冀小斌均为留美学生，冀家在纽约皇后区森林小丘(Forest Hills)置有房产，俾学财经的冀小坦和史学家冀小斌(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到纽约时有居停之处。汪向同说，一九六三年冀朝铸陪周恩来访问巴基斯坦和非洲得知妻子怀孕，周恩来建议，如生男即以巴基斯坦命名，如生女，即以非洲命名。

汪向同一九三零年生于北平，其父汪申(申伯)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巴黎建筑学院毕业，曾任北平市工务局长，一九四六年由留法老同学魏道明介绍到台湾任职陶业公司，后任教台北二专(现为台北科技大学)。除了汪向同(一九四八年去过台湾)和母亲留在大陆。汪申的几个儿子全都到台湾，这层“海外关系”，使汪向同在公职生涯中一再受到牵累。汪向同一九五一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曾在联合国做过笔译员；一九八零年和冀朝铸一起到洛杉矶探望睽违三十二年的父亲，这也是汪父第一次和女婿见面。冀朝铸出任驻英大使期间(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一)，九十四岁的汪申辞世。

冀朝铸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英语传译任务，最具刺激性的是一九七一年夏为基辛格和周恩来的密谈当翻译(唐闻生为另一译员)；最有成就感的是一九七九年年初陪同邓小平访美，他在卡特总统于白宫玫瑰园举行的欢迎国宾典礼上所作的翻译，享誉全美。《纽约时报》甚至发表《不可或缺的冀先生》(The Indispensable Mr. Chi)社论，盛赞冀氏的口译才能，同时亦感叹美国缺乏这种人才。事实上，冀氏陪邓小平访美时，已七年未做口译，其间只有三次奉外长乔冠华之命为毛口译三次，每次仅十几分钟。最赏识冀朝铸的周恩来不止一次地表示，做口译很累，年纪一大就应改做外交工作。冀氏是在四十三岁时(一九七二)停做口译。

基辛格于一九七一年七月秘访北京与周恩来会谈的第一天中午，周氏突然在午宴席上大谈文革。冀氏说，当时听起来似感觉周恩来在做自我批评(未能赶上毛思想)，但日后回想，始惊觉到周恩来是在批毛，暗示他并不完全赞同毛的做法(凡事不能太过极端)。

◇ 基辛格惊见反美标语

同年十月，基辛格二度访问北京，与中方商讨翌年尼克逊访华签订《上海公报》的内容，当时北京气氛非常紧张，基氏一行入住钓鱼台后，赫然发现每一个房间都贴满了反美大字报。基辛格极为不悦，但他很有风度地处理此事，美方把所有的大字报撕下来交给外交部礼宾司，基氏对中方说，这些大字报大概是上次的客人忘了带走。周恩来获悉此事后，当天即在人民大会堂的晚宴中发表温馨诚挚的祝酒辞，并向基氏一行逐桌(包括专机机员)乾杯，化解了四人帮企图损害中美谈判的阴谋。

冀朝铸得到周恩来的充分信任，但在周生病期间，外交部成为四人帮夺权之地。冀氏指出，唐闻生最早投靠江青，后来拉上王海容。她们成为江青掌控外交部的“联络员”，并想尽各种办法对付冀朝铸，唐闻生点子最多。自恃甚高的乔冠华和妻子章含之亦卷入江青等人的权斗。乔曾三次从五七干校把冀朝铸找回来隐居乔氏史家胡同住宅（其实是章含之养父章士钊故居）。乔氏希望冀朝铸与他们合作以讨好江青并对付唐、王，以期影响毛。冀表示这样做很危险，而且大家都讨厌江青。乔冠华诡异地说道：“小冀，这就是以毒攻毒。”日后的发展是，没有原则而又愧对周恩来的乔冠华被解职，受调查和被批判。章含之虽出版一批充斥曲笔的回忆文章和专书，但乔氏夫妻投靠四人帮，打击周、邓的做法，早已为人所不齿。前中国驻美大使章文晋的妻子张颖即写过一系列文章批评乔冠华。

◇ 江青与王海容斗

冀朝铸说，最荒谬的莫过于毛泽东死后，江青和王海容当庭当众打架的事情。毛的棺材停放在人民大会堂时，江青送了一个花圈摆在棺材旁，王海容对江青在花圈上写的悼辞（江青自称是毛的“学生”）不满，当场痛骂江青，两个人竟打起来，王狂抓江青的头发，一抓却把整个假发抓下来，江青露出了一个大光头。

唐闻生和王海容曾多次想阻止汪向同赴美与冀朝铸会合，但在一九七七年七月，唐、王垮台。冀氏曾在干校看到一部大卡车司机数度要开车撞击唐闻生。唐看到冀在旁边，即表示要和他谈谈，冀说没什么好谈的，此后冀就一直避免和唐见面。唐复出后，曾在英文《中国日报》当副总编辑，后转任铁道部外事局长，数年前曾访问她的出生地纽约。唐今年六十五岁。

◇ 美建议派医治周恩来

冀朝铸说他在文革时，有一天躺在地板上凝视毛泽东照片，心里说的是：“毛主席，你疯了吗！”他说，尽管毛是现代中国、革命中国之父，但他制造了不少大灾难和大错误。

冀氏在中国外交部的权斗中，从驻美大使馆的第二号人物被贬为驻斐济大使；他亦透露基辛格获悉周恩来患重病时，曾要求他向中南海传话，美国很愿意派遣最好的医生为周治病，冀把话带到了，但毫无下文。

冀朝铸这本书为中国现代外交史、中美关系史和中南海权斗史平添弥足珍贵、不可或缺的回忆。

□ 原载《亚洲周刊》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